语言治理文献综述

胡悦

朱萌[[1]](#footnote-20)

**摘要**：

**关键词**：语言治理

**Abstract**:

**Keywords**: Language governance

# 引言

语言在治理的发展和传播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Miller and Rose (1990) 认为正是语言通过对词汇和理论的解释，把政府的治国理念和方针进行了详尽的阐释。换句话说，政治治理的一部分就是语言对相关问题的描述和阐释方式的发展。 Warner (1992) 就此观点给予了进一步的论述，指出治理不仅规定了人们所使用的词汇和语言，同时通过这些词汇和语言控制改变着人们的交际行为，借此加强他们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情感方面的联系。语言还能为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以及文化传承服务。 李光耀 (2013) 指出，语言不只是沟通的工具或教学媒介语，其中还牵涉到更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课题，可以成为政治和经济政策成功的重要推动力。 由此可见，语言在治理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能构架治理过程中相关问题的论述，同时还能规范人们对语言的使用。 国外新近出现的政治语言学(politico linguistics)也告诉我们，语言与政治关系密切，语言的治理需要乃至必须体现政治的立场和政治的高度。 Schlyter (2003) 直接指出，语言是政治游戏中的一个“小卒”。国家语言治理的决策往往不是由语言学家或语言教师来做出，而是由政治家来制定的(Kathryn and Kendall 2017)。而语言治理就是指语言或语言形式跨越不同的机构（如法律、教育、卫生），通过使用不同的工具（如书籍、法规、考试、论文）规定了不同人、群体、组织对语言的使用及其思想行为的过程(Heath 1977)。语言对现实政治生活有着重要的作用。 目前学界从语言政治学角度对语言治理的研究进行系统综述与评介的文献研究较少。本文主要聚焦语言对政治社会的影响，评述这一研究领域的相关文献和最新进展，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得到了国内外政治学家和语言学家的广泛关注(Hu 2019, 2020; 戴曼纯 2019)。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引言；第二部分对国内语言治理研究进行了系统总结和评述，通过梳理相关理论观点，厘清当前国内语言治理的三个面向；第三部分综述了国外语言治理的研究文献，系统梳理了相关理论及研究内容；第四部分为总结。

# 国内关于语言治理的研究

上述论述无一不揭示了语言治理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重要角色，当前语言治理受到国内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有关语言治理的研究数量也日益增多，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 语言与国家治理（宏观）

“关于语言，最重要之处在于它能够产生想象的共同体”(Benedict 2005)。 从秦始皇统一文字到汉武帝独尊儒术，从孝文帝“断北语，从正音”到隋文帝科举选拔，从宋代《广韵》、明代《洪武正韵》到清代“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民国时代“国语运动”“白话文运动”，再到新中国的推广普通话、简化汉字、汉语拼音方案推广、语言文字信息化、语言文字法律法规体系、微语言治理等，上述波澜壮阔、传承延绵的中华语言治理历史无不表明了语言是国家认同建构的重要对象和核心构成要素。 王春辉 (2020) 就指出，多民族国家通常会以不同的方式制定各类语言政策，实施语言规划，配合语言民族主义或语言爱国主义，以此巩固、发展和强化公民的国家认同。 例如，部分学者就认为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有利于构建民族或国族身份，加强各民族、各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消除因语言差异带来的不安，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张卫国 2020; 黄少安 and 王麓淙 2020)。 如，朱苏力通过对中国古代“官话”这一文化制度特殊意义的独到分析，回溯了“书同文”对秦朝建构统一国家，塑造民族认同的重要意义； 陈新仁 (2014) 就提出，由于建构民族国家的需要，人们希望通过统一语言进而实现再造新国民、消弭地域保护主义和加强民族国家的认同； 张建伟 (2017) 通过对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用于规范全国方言的“标准语”和“二战”后推广“共通语”的研究，指出语言对解决国家整合和认同问题的重要作用； 王振顶 (2009) 也从文化史的角度指出，三个在语义上有着诸多微妙差别的官话、国语、普通话通常被人们认为是同一事物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称呼，实际上表征了不同社会阶层和政治派别通过对标准语的“正名”； 但另一方面，传统理论认为，在多语言社会中，人们偏爱讲听众方言的政府代表，因为这表明了一种共同的文化认同，即“文化标记”效应，因此方言和民族语言对于地方治理和基层治理而言，有助于加强政策宣导效果，提高官民沟通效率(方艳 2015; 陈平 2008)。 譬如，刘华夏 and 袁青欢 (2017) 从语言功能的角度提出，国家通用语言使用的便利性低于方言和民族语言，而交际便利与否是语言使用的关键因素，因此在少数民族聚居使用民族语言或者在地方使用方言更有利于政策的传达和民众的理解；如某扶贫工作队在地方上宣讲十九大精神时，采取“本地人”用“本地话”讲“本地事”的形式，收到了良好效果(郭光文 2017)； 朱学佳 (2006) 在调查维吾尔族使用汉语方言词的状况后发现，在维吾尔族聚居区，维族群众之间、维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群众之间、维吾尔族与汉族群众间交流通常使用维语，国家机关在执行公务、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在进项宣传时，亦是如此。 不过 Hu (2020) 提供了一种有别于上述文化标记理论的替代机制——“权威标记”效应。他指出，在该机制中，政府将官方语言指定为政治权威的标志会影响人们的态度，即听众会将他们对政治权威的尊重投射到使用这种标记语言的政府代表身上，这其实表明了听众对讲官方语言的官僚比对讲听众方言的官员有更高的信任。 另外，也有学者提出警示，方言对地方保护主义以及民族语言对分裂势力的作用不容小觑，需要时刻注意分裂型语言民族主义(陈平 2008)； 戴曼纯 and 朱宁燕 (2011) 通过解析前南斯拉夫的语言政策及规划，强调国家在处理通用语和地方语言/民族语言的关系时，应当警惕其负面效果； 吴晓芳 (2016) 基于对台湾青年语言能力和母语认同的实证研究发现，带着“去中国化”使命的台湾乡土语言政策更多的是政治上的造势与考量，并提出了一系列反制语言“台独”的建议与对策。 国族的“共同记忆、历史传统、文化、价值”等要素的培育和传递，都需要统一的民族语言作为基础(Anthony 2002)，国家通用语作为国家记忆和文化的主要载体一直以来受到各国政策制定者的关注和争相推广，例如先秦的雅言、汉魏的正音、隋唐的雅韵及字样、宋元而至明清的官话以及近现代的国语和普通话等语言治理之策就一直是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方言和民族语言作为力量，具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作用，既可以有效传达政治信息和推动政策目标的实施，从而提高地方治理绩效，也可以被用来实施民族分裂和种族异化、谋取不正当利益，成为民族运动领导层得心应手的政治工具(戴曼纯 and 朱宁燕 2011)。因此在语言政治生活中，国家应当合理安排语言政治权力，实现语言政治权力的善治(王振顶 2009)。

## 语言与公民个体（微观）

上述研究对有关语言政策和语言治理的关注点从宏观角度出发，主要停留在其对于社会发展和国家政治秩序的塑造能力上，国内也有大量的社会语言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从微观角度强调语言治理对个体认知和群体心理方面的重要作用，即将语言视为建构社会身份认同和划定群体边界的重要指征(杨宝琰 2014)。 社会成员可以利用外貌、仪式、行为等多种方式彰显群体归属，但人类社会自古以来最简单也是最有效表明自己身份和判断他人身份的手段就是语言(Fukuyama 2016)，并通过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改变或提高自己的身份(王克非 2011)。 因此，语言在很大程度上也被认为是文化成熟的标志和厘定文化群体（cultural communities）边界的核心指标。 例如，刘华夏 and 袁青欢 (2017) 就基于对不同个体语言能力差异的研究指出，语言差异会影响群体之间的相互认同，乃至形成心理隔阂，从而造成社会认知和社会判断的固化。因语言而划定的群体边界，使人们在心理和文化上对“我者”与“他者”做出判断，即对属于本群体内部的人有着较高的信任，更能相互包容和团结，更能遵守群体规范，有利于破除集体行动的困境。 方艳 (2015) 通过考察农民工对再家乡方言、类普通话和城市方言间的语言选择，发现语言对个体身份认同会产生重要影响； 另外，由于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促成了频繁的人口流动，或由于务工之需、或由于教育、或由于家庭搬迁、或由于城镇化提升，国内出现了大量的新市民或流动人口(武小军 2020) 因此无论是农民工还是城市新市民，他们必然带来语言的接触和融合，导致语言地图的变更：亦或是在当地语言之外形成了“方言岛”，亦或是与当地逐渐接触、融合而产生了新的语言变异和变体。所以从2000年至2019年间，国内学界从政治心理学和政治语言学角度针对流动人口描述的研究成果不断产生，调查地点也广泛涉及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宁波、成都、重庆、西安、乌鲁木齐等东、中、西若干一线、二线城市(武小军 2020)。 例如，付义荣 (2010) 通过对安徽无为县傅村进城农民工的采访研究，发现傅村农民工普遍认为普通话更好听，也更有用，从而导致对普通话的语言认同开始增强；屠国平 (2008) 通过全面考察宁波市外来人口的语言生活，发现普通话使用频率最高，已经作为通用语言被普遍认可； 王玲 (2012) 以合肥、南京和北京的语言调查数据为基础，对城市居民的语言适应行为及其特点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不同语码功能和关系的变化促使外来移民对普通话和方言的认同有所差异； 此外，马戎 (2017) 、武小军 (2015) 、 张先亮 (2018) 等均从城镇化过程中和城乡群体互动交融角度，印证了语言治理的心理效用。 更进一步，Hu (2020) 将语言态度研究拓展到少数群体以外的国民全体，通过“权威标记”理论探索语言态度对具有普遍意义的政治信任的影响。

## 语言与精准扶贫（热点）

近年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成为中国国家治理的重点工作。201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首次在扶贫政策文件中明确提出“在民族地区全面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2017年教育部、国家语委出台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程实施方案》，提出“扶贫首要扶智，扶智应先通语”。 2018年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办印发了《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攻坚实施方案(2018—2020年)》，特别指出要面向“三区三州”实施推普脱贫攻坚行动；同年，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办、国家语委制定了《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2018—2020年)》，提出要“充分发挥普通话在提高劳动力基本素质、促进职业技能提升、增强就业能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推普脱贫是我国政府聚焦于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通过语言治理实现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 李宇明 (2021) 就强调要充分认识语言的扶贫功能，为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修筑脱贫的语言大道，为当地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贡献“语言之力”； 王春辉 (2019) 也认为，虽然语言能力的缺乏和语言上的弱势不是导致贫困的直接原因，但语言藩篱对贫困地区发展的束缚性越来越强，要注重语言政策与规划在语言扶贫中的作用。可见语言对贫困地区的治理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 一方面，部分学者从普通话或国家通用语角度强分析语言治理对精准扶贫的促进作用，强调通过推广普通话，提高少数民族贫困人口使用普通话的能力及该地区普通话的普及率，构建沟通桥梁，打破贫困地区和外界信息交流的 “语言屏障”，从而推动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李宇明 2018; 王春辉 2019; 马戎 2017)。 例如，张卫国 (2020) 基于2013和2015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从三个维度（经济、健康和精神）对普通话的减贫效应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普通话能力对经济贫困、健康贫困和精神贫困均具有减贫效果，强调注重语言规划多维度、多方面的影响。 王浩宇 (2019) 通过对天祝藏族自治区少数民族语言距离的研究，提出语言资源的差异可能会导致个体机会的不平等和社会阶层的差距，强调语言政策的制定必须关注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促进语言资源共享和均衡发展，实现代际跨越，助力永久脱贫。 另一方面，有些学者提出，语言治理要关注少数民族语言和地区方言，通过对少数民族地区当地语言的规划和管理，发掘少数民族语言的本体资源(刘华夏 and 袁青欢 2017; 苏德 2004)。 史维国 and 刘昕怡 (2019) 认为，国家在制定相关语言政策，利用语言推动扶贫进程时，既要坚定推广普通话，又要有语言保护意识，处理好二者之间的矛盾，形成推广普通话和保护少数民族语言互促互补的良好局面； 陈丽湘 and 魏晖 (2019) 就从语言规划的角度提出，任何国家都会面临最优语言配置问题，因此国家在整合和配置语言资源时，要努力实现国家通用语言与民族语言、方言之间的相互补充、各得其所的“帕累托最优状态”。 当下，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聚焦于精准扶贫而实施的语言扶贫如何适应新战略对语言服务社会和国家的总体要求(杜敏 and 刘志刚 2020)，如何实现语言治理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的顺承与衔接是当前亟需回答的问题。

# 国外关于语言治理

国外有关语言治理的路径大体分为三个导向：语种区隔导向、语言政策导向和语言心理导向。 语种区隔导向以斯坦福大学的David Laitin为代表。该方向沿用传统社会政治学研究方法，通过不同语言在语言学上的差异（通常表现为在语言谱系数上所属分支距离远近来衡量）理解语言所产生的区隔效应，进而揭示不同语言使用人群在群体意识、国家身份，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等多个层面差异性，以及对国家社会经济制度特征的影响。对于衡量语言距离的方法之后多有发展，但语种区隔的理论逻辑在诸多后续研究中得到继承(Isphording and Otten 2012)； 政策导向研究则延续政治经济学和族群政治传统，重在讨论语言政策在跨族群社会和国际交往中的作用。 Liu (2015) 的代表作(Standardizing Diversit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anguage Regimes)则是这方面的标志性著作。 她将语言政策以是否为主体民族语言和是否存在多官方语言两个维度划分了四类，讨论了四种语言政策对国内族群互动社会资本和国家对外交往、投资引入的对外资本的影响。 此方向后续文章则陆续从政策成本、族群权力、迁移风险等诸多方面深化语言政策对族群稳定、经济发展和政策制定等政治结构和决策的影响(Cook and Liu 2016; Liu and Pizzi 2018)，并通常应用于以族群或认同差异性为前提的国家和跨国案例。 例如，Laitin (1977) 基于对非洲新兴独立国家国家意识的建构过程研究发现，语言政策在社会成员族群意识、国家身份，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等多个层面参与塑造一国的社会经济制度特征；Liu (2015) 则通过语言政策的跨国比较，发现一国语言治理取向会直接影响该国的民族关系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模式以及立法结构； Vroome, Hooghe, and Marien (2013) 团队对美国移民和少数族裔的长期观察，发现语言政策和语言治理会对这些少数族群的社会地位认知、社会融入程度，乃至社会参与意愿产生显著的导向作用； 最后一类研究以个体语言习得过程中产生的心理变化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索语言学习对更广泛社会政治生活和自我认知建构的影响。这方面较为成熟的是对“语言态度”（language attitudes)的研究，即研究人们在听到特定语言类型后对于语言使用者的直观感受和印象(刘虹 1993)。 早在1987年，Kalmar, Yong, and Hong (1987) 就研究过中国广州地区民众对于不同种类的语言类型使用人群的感情和态度差异。在政治认知方面，主要成果集中于讨论少数族裔对主流群体语言感受及国家认同、移民政策等研究。 比如，Dowling, Ellison, and Leal (2012) 通过研究说美国墨西哥移民对英语的态度，发现这些西班牙使用者其实对英语的重要性最为重视。近期政治科学家对超越语言态度的听辨层次的语言影响也进行了更广泛探索。 比如，Pérez and Tavits (2017) 从语法差异角度讨论不同语言使用者对于女性以及时间概念的差异，进而对这种差异造成的个体在性别政策、环保以及财政政策偏好的影响。 Hu and Liu (2020) 则基于跨国调查揭示语言对于塑造个体国别观的显著效果。

# 总结

通过梳理国内外语言治理的相关文献，有以下结论与启示。

总体上，现有国内外研究总体上呈现了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影响社会成员政治社会生活和取向的多层次、多面向影响，虽然国内外学者对语言治理的作用和认识各不相同，无论是语言政策对于国家认同的作用亦或是对微观个体心理的影响，但上述研究却将是我们在较大范围内从事理论概括和理论创新的坚实基础，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设计和研究方法。 不过，国内外学界对于语言治理研究的不同点也值得我们注意： 首先，研究侧重点有所差异。就国内语言治理而言，当前研究绝大多数集中在国家通用语（如我国的普通话）、少数民族语言或是地方方言政策，鲜有学者从英语角度对本国语言治理深入研究，尤其是实证研究在我国还少有出现。国内学界有关外语语言治理主要基于经济学从人力资本视角进行分析。 比如，周红 (2000) 从语言的经济价值角度阐述了英语是一种具有经济价值的投资，强调语言的经济价值对我国外语教育改革的指导意义； 江桂英 (2010) 考察了我国英语教育的公共投资和个人投资问题,试图为我国的英语教育提出一些政策性建议； 徐启龙 (2010) 分析了英语在人力资本构成要素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揭示语言的经济学分析这种视角对当前我国语言政策规划的意义。 秦彦彬 (2014) 对韩国、日本、以色列、法国四个国家的英语语言政策的实施进行了研究，表达出实现英语语言政策有利于提高国家实力。 但随着语言日益成为一种具有政治价值的社会资源，有关英语语言治理对个体所产生的政治后果应当受到学者们更多的关注； 而国外主要从语言治理的族群角度，聚焦于英语和本国语言问题。 如，Vroome, Hooghe, and Marien (2013) 通过对美国移民和少数族裔的研究发现语言政策对少数族群的社会地位认知、社会融入程度，乃至社会参与意愿产生显著的导向作用，掌握英语更好的少数群体的社会融入程度往往更高。

其次，研究方法各有千秋。 国内现有研究主要基于本土案例开展质性研究。 如，朱学佳 (2006) 通过对维吾尔族使用汉语方言词的社会心理调查分析发现，国家语言政策的引导与个人的语言运用及其在社会网络中的地理等级相关； 武小军 and 王艳 (2021) 基于对甘孜藏区幼小教师普通话水平现状与影响因素的分析，提出要重视相关语言政策及规划在藏区学校的“落地”问题，特别是在偏远乡村、牧区学校的推行；而国外既有研究更多侧重量化分析和效果研究，对语言影响的具体机制缺乏探究等，逻辑联系尚待深入。 如，Wright and Taylor (1995) 基于母语教育对少数民族儿童的学业和心理发展的研究发现，少数民族学生在不熟悉教学语言情况下，极易导致自信水平下降，持有更多的消极自我评价；George Lakeoff 对美国政党语言使用情况的分析后得出，保守派拥护者之所以对所持意识形态更为坚定，是由于共和党政客已熟练掌握激发其“严父”语言模式，不断巩固拥护者价值观。 上述研究差异的不同，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情差异所致。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治理模式的双重变革时期。 变革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结构和治理策略变，均对国民政治社会心理产生巨大影响，相应一系列问题也随之凸显。 比如，由于经济结构剧烈变化而导致的国民自我定位错位(景怀斌, 傅承哲, and 许晓丽 2017)，由于人口结构变化和加速城镇化带来的人际信任缺失和新、老市民身份认同矛盾(卢晖临 and 潘毅 2014)，以及人民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需求与政府治理方式的不匹配等问题，都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亟需关注的问题(李蓉蓉 2013)。 如果处理不当，将极易造成民众情绪激化，甚至演变成恶行群体事件，损害社会稳定，威胁正常政治经济秩序(郝宇青 and 车跃 2011)。 然而，面对新时期新的治理问题和治理需求，不仅需要社会管理者的策略调整和适应，还需要对公众的同步调节，方能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良性发展和制度建构。 毫无疑问，语言这一重要因素在其中作用不言而喻，因此有关语言治理对国家社会的影响仍需深入研究。

Anthony, Smith. 2002. *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 中央编译.

Benedict, Anderson. 2005. *想象的共同体*. 上海人民出版社.

Cook, Thomas, and Amy H. Liu. 2016. “Using Linguistic Networks to Explain Strength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World Development* 87: 128–38.

Dowling, Julie A., Christopher G. Ellison, and David L. Leal. 2012. “Who Doesn’t Value English? Debunking Myths About Mexican Immigrants’ Attitudes Toward the English Language.”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93(2): 356–78.

Fukuyama, Francis. 2016. *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Heath, Shirley Brice. 1977. “A National Language Academy? Debate in the New Nation.” *Linguistics*.

Hu, Yue. 2019. “Refocusing Democracy: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Framing Strategy in Political Language: Democratization: Vol 27, No 2.” *Democratization* 27(2): 302–20.

———. 2020. “Culture Marker Vs. Authority Marker: How Do Language Attitudes Affect Political Trust?” *Political Psychology* 41(4).

Hu, Yue, and Amy H. Liu. 2020. “The Effects of Foreign Language Proficiency on Public Attitudes: Evidence from the Chinese-Speaking World.”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20(1): 1–23.

Isphording, Ingo, and Sebastian Otten. 2012. *The Costs of Babylon Linguistic Distance in Applied Economics*. DE: RWI.

Kalmar, Ivan, Zhong Yong, and Xiao Hong. 1987. “Language Attitudes in Guangzhou, China.” *Language in Society* 16(04): 499–508.

Kathryn, Stemper, and King Kendall. 2017. “Language Planning and Policy.” In *The Handbook of Linguistics*, John Wiley & Sons, Ltd, 655–73.

Laitin, David. 1977. “Politics, Language, and Thought: The Somali Experience.” *American Ethnologist* 5(4): 797–99.

Liu, Amy H. 2015. *Standardizing Diversit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anguage Regime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Liu, Amy H., and Elise Pizzi. 2018. “The Language of Economic Growth: A New Measure of Linguistic Heterogeneity.”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28.

Miller, Peter, and Nikolas Rose. 1990. “Governing Economic Life.” *Economy and Society* 19(1): 1–31.

Pérez, Efrén, and Margit Tavits. 2017. “How Language Shapes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Gender Equality.”

Schlyter, Birgit. 2003. “Sociolinguistic Changes in Transformed Central Asian Societies.” In *Languages in a Globalising World*, eds. Jacques Maurais and Michael Morr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57–87.

Vroome, Thomas, Marc Hooghe, and Sofie Marien. 2013. “The Origins of Generalized and Political Trust Among Immigrant Minorities and the Majority Population in the Netherlands.”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29: 1336–50.

Warner, Michael. 1992. *The Letters of the Republic: Publicat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Eighteenth-Century America*.

Wright, Stephen, and Donald Taylor. 1995. “Identity and the Language of the Classroom: Investigating the Impact of Heritage Versus Second Language Instruction on Personal and Collective Self-Esteem.”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87(2): 241–52.

付义荣. 2010. “也谈人口流动与普通话普及以安徽无为县傅村进城农民工为例.” *语言文字应用* (02): 73–81.

刘华夏, and 袁青欢. 2017. “边疆语言治理的挑战与转型.” *广西民族研究* (06): 8–15.

刘虹. 1993. “语言态度对语言使用和语言变化的影响.” *语言文字应用* (03): 93–102.

卢晖临, and 潘毅. 2014. “当代中国第二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情感与集体行动.” *文化纵横* 5.

史维国, and 刘昕怡. 2019. “少数民族地区语言扶贫效应研究.” *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0(02): 88–91.

吴晓芳. 2016. “从台湾青年语言能力、母语认同看台湾乡土语言政策的成效.” *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0(05): 24–31.

周红. 2000. “从语言的经济价值角度看我国的外语教育.” *浙江经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04): 59–62.

屠国平. 2008. “宁波市外来人口语言生活状况考察.” *语言文字应用* (01): 48–57.

张先亮. 2018. *《城镇语言生态现状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张卫国. 2020. “普通话能力的减贫效应:基于经济、健康和精神维度的经验分析.” *语言文字应用* (04): 37–51.

张建伟. 2017. “语言与国家建构漫谈.” *语言战略研究* 2(06): 8–10.

徐启龙. 2010. “基于语言经济学视角的我国外语教育决策研究.” *全球教育展望* 39(03): 93+95–96.

戴曼纯. 2019. “国家语言能力的缘起、界定与本质属性.” *外语界* (06): 36–44.

戴曼纯, and 朱宁燕. 2011. “语言民族主义的政治功能以前南斯拉夫为例.” *欧洲研究* 29(02): 115-131+160-161.

方艳. 2015.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方言传播与身份认同研究.” *新闻大学* (02): 88–91+143.

景怀斌, 傅承哲, and 许晓丽. 2017. “民众核心价值观的认知状况及作用机理.” *青海社会科学* (6).

朱学佳. 2006. “维吾尔族使用汉语方言词的状况调查.” *语言文字应用* (02): 43–51.

李光耀. 2013. “李光耀回忆录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学习月刊》2015年07期.”

李宇明. 2018. “语言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5).

———. 2021. “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促进民族地区发展.” *中国民族报*: 005.

李蓉蓉. 2013. “城市居民社区政治效能感与社区自治.” *中国行政管理* (03): 53–57.

杜敏, and 刘志刚. 2020. “论语言扶贫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可持续性.”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9(02): 95–105.

杨宝琰. 2014. “语言、双语教育与族群关系:社会心理学的探究.”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51(02): 128–33.

武小军. 2015. “新生代流动人口的语言选择与变化.” *语言教学与研究* (03): 104–12.

———. 2020. “语言适应与社会顺应语言视域下对流动人口‘市民化’进程的思考.”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9(05): 91–99.

武小军, and 王艳. 2021. “甘孜藏区幼小教师普通话水平现状与影响因素.”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40(03): 18–25.

江桂英. 2010. “语言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英语教育成本收益分析.” *制度经济学研究* (01): 184–94.

王克非. 2011. “外语教育政策与社会经济发展.” *外语界* (01): 2–7.

王振顶. 2009. “语言的政治学分析.” *周口师范学院学报* 26(03): 75–78+82.

王春辉. 2019. “语言与贫困的理论和实践.” *语言战略研究* 4(01): 12–21.

———. 2020. “论语言与国家治理.”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52(03): 29–37.

王浩宇. 2019. “藏族青年语言能力与社会经济地位关系调查研究:以天祝县为例.” *语言战略研究* 4(1).

王玲. 2012. “城市化进程中本地居民和外来移民的语言适应行为研究以合肥、南京和北京三地为例.” *语言文字应用* (01): 75–84.

秦彦彬. 2014. “国外英语语言政策实施及其启示.”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41(S4): 141–43.

苏德. 2004. “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综述.”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11): 1–6.

郝宇青, and 车跃. 2011. “怨恨情绪及其化解:必须高度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 *探索* (04): 70–76.

郭光文. 2017. “讲准‘普通话’ 说清‘地方语’.” *湖南日报*: 002.

陈丽湘, and 魏晖. 2019. “推普脱贫有关问题探讨.” *语言文字应用* (03): 2–11.

陈平. 2008. “语言民族主义:欧洲与中国.” *外语教学与研究* (01): 4–13+80.

陈新仁. 2014. “语用学视角下的身份研究关键问题与主要路径.” *现代外语* 37(05): 702–710+731.

马戎. 2017. “汉语学习与中国少数族群的现代化.” *社会政策研究* (01): 110–24.

黄少安, and 王麓淙. 2020. “民族地区语言扶贫的经济理论基础和实证分析.” *语言文字应用* (04): 26–36.

1. 胡悦，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朱萌，通讯作者，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 [↑](#footnote-ref-20)